

龙登高 著

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



人民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4 6959 7

龙登高 著

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龙登高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 12

ISBN 7-01-002256-9

I. 中...

II. 龙...

III. 市场-历史-中国-古代

IV. 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8562 号

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

ZHONGGUO CHUANTONG SHICHANG FAZHAN SHI

龙登高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新华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8.125

字数: 429 千字 印数: 1-3, 000 册

ISBN 7-01-002256-9/K·485 定价: 24.50 元

序

在一个社会中，当产品生产之外又出现产品交换之后，生产与交换二者便成为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了。恩格斯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①在《反杜林论》的《政治经济学》编一开始便说：广义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社会职能的每一种都处于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响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各自的特殊的规律。但是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作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接着又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②细绎以上所引可见，经济史研究的对象也正是如此；研究的目的也不外是发现历史过程的运动规律。毫无疑义，我们应当把各个历史时期的生产和交换置于首要地位，并以之为坐标，绘制出各个时期的经济曲线。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第2版，第704—70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第2版，第489页。

生产的重要性人皆知之，至于交换，为什么也那样重要呢？究其原因，主要是交换出于分工，没有交换，分工便难于进行；而交换的发展，还使得分工扩大，导致服从它。进一步出现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于是在传自远古的唯一经济形式——自然经济之外，出现另一种经济形式——商品经济。这两种经济形式是相矛盾的。在古代，它们此进彼退，此消彼长，时有起伏。但总的趋势则是商品经济排挤自然经济，最终使整个社会成为列宁所说的“商品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任何生活资料的取得都舍交换而莫由。交换的重要性就勿庸多置辞了。

由此说来，我们从事经济史的研究，毫无疑义，应当把各个历史时期交换的发展和变化置于首要地位，大力去探索它。

那么，从何着手去进行这种探索呢？回答是——从市场着手。

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和领域”。^①它如影随形地随着商品交换的出现而出现，也随着商品交换的荣枯而荣枯。它和交换简直可以说是同义语。不宁唯是，它同时还是商品经济活动的舞台。但它不是木然地空在那儿等待演员，而是能动地反过来左右演出。马克思说：“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②这里说的生产当然是指商品生产。由此说来，市场既是商品交换的聚焦点，还是商品经济运转的轴心。我们研究经济史无疑应当抓住这个契机。

但是，不能不引以为憾的是，环顾我国史林，这方面的著述实在太少了。什么缘故？是不是文献不足征，难为无米之炊？登高博士的这部著作就足以说明：并非如此。我的浅见以为，其故盖在传统偏见和极“左”思潮的影响。所谓传统偏见指的是我国

① 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市场”条，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第2版，第17页。

古代对商人和商业的鄙夷。这是阶级的偏见，来源很古。据近人研究，早在商朝时期，工商业已颇有发展。（“商人”的称谓可能即因系商朝人而得名，有如后世华人在汉时被称为“汉人”，在唐时被称为“唐人”。）那时的工商业均为王室、公室、官府所有，私人是没有的。士庶人只有家庭手工业和集市上剩余产品的交换，像青铜器、玉器之类的手工业品是不可能生产的。王室、公室、官府占有善技艺和善经商的奴隶，用以生产各种产品和到方国部落间去进行贸易。西周代商，“因于殷礼”，工商业的状况大体因仍旧惯，未闻有多大改变。王玉哲教授称西周手工业工人为“工奴”、商人为“商奴”；并说：“工商皂隶，不知迁业”，都是世职，没有自由。^①这个见解，大概是古史专家们的共识。由此说来，工商业者很早就处于卑贱的地位，自然要受到人们的鄙夷。

周室东迁以后，工商业日益发展，有厚利可图，于是在官府工商业之外，兴起了私人的工商业。到春秋末期，私人身份的大商人、大工业家令人侧目地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由此突起；记述这个高峰景观的《史记·货殖列传》也由此开篇。取《史记·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合而观之，可见在这高峰突起前夕，即春秋之世，在官府工商业之旁，原来微不足道的民间工商业，潜滋暗长地成长起来了，并开始改变其附庸的角色与地位。自此，民间和官府的工商业双轨并驾，一直延伸到清代，但占主导地位的不是官府工商业，而是民间工商业，愈后而愈著。市场几乎全是他们的天下。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千百年来的传统观念。工商业仍被视为“末业”、“末利”、……工商业者，特别是商人，则被称作“末民”，受到鄙视，甚至仇视。其著者如

^① 说详王玉哲：《中国上古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二章。

商鞅变法，下令：“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竟图一举消灭民间工商业，把民间工商业者抑为奴隶。接下来秦汉施行的七科谪，其中四科都是对商人的。（若其三代中有一代是商贾，有市籍，便要受谪发。）汉高帝还“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虽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到武帝，狂风暴雨般的打击忽焉降临到商人头上。盐铁等大宗商品的生产收归官府经营；算缗和告缗令的施行，弄得“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经济曲线，像滑雪似的，陡然从顶峰降到深谷。太史公作《货殖列传》恰好也就到此搁笔。（不搁，还写什么呢？）

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斗争的结局是，年轻的商人阶级败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者的淫威之下；商人有所上升的社会地位又复下降了；商人的乐园——市场，消然了；总之，商品经济发展的势头被遏止了。不宁唯是，近两千数百年来中国经济的支配形态是地主经济，秦及西汉是这种经济及建立于其上的各种制度始创和定型的阶段；而汉武帝统治的半个多世纪则是这个阶段的关键时期。这时的许多措施都为后世所沿用，虽有损益，但基本格局不改，如管榷制度、对商贾工匠身份的规定、……便是。为什么商鞅、汉高祖、汉武帝等要施行那样的经济政策呢？这不只是为了解决国家财政之类的问题，而是有更为深刻的原因的。马克思说过：凡在农村公社具有“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而保持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的特征的任何地方，农村公社总是把“集权的专制制度矗立在公社的上面”。^① 在另一部著作中，马克思又说过：19 世纪的法兰西农民，是一个阶级，又不是一个阶级，“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1963 年版，第 436 页。

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① 这些论述给我们以深刻的启发。显然，我国夏商周三代的基层单位正是具有上述特征的农村公社，即井田制，因此有一套专制制度矗立于其上。春秋战国之际，农村公社解体。代之成为社会基层单位的是类似上述法兰西小农那样的个体农户。因此出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就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了。农村公社和个体农户的经济都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不相容。此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既已使农村公社解体，又要进而蚕食个体小农，若任其发展，就会导致动摇专制统治的基础，削弱中央集权的威势，引发政治和社会的动荡。这怎能不引起统治者的仇视和打击呢？在这一点上，地主阶级和统治者完全利害一致。他们也企图不冲击自然经济，只用超经济强制的方式剥削农民，认为这是最根本的。商品生产和流通不过是一种补充。工商业与农业相较，农业是“本”，“本业”、“本利”、“本富”，工商业是“末”，“末业”、“末利”、“末富”。“舍本逐末”，不论是统治者或地主阶级都是不允许的；他们都要求“重本抑末”。汉文帝、景帝多次下诏，强调：“农，天下之本”，“天下之大本”，……“末”这个字有“非根本的、不重要的”之义。既如此，自然就使鄙夷的，甚至仇视、敌视的传统观念历久不改。加上商人、市场总伴有欺诈、作伪等不良行径，传统观念就更不易消失了。

下面略谈一下极左思潮的影响。极左思潮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等量齐观。诚然，资本主义的经济是商品经济，但不能倒过来说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须知，不仅资本主义社会有商品经济，就是古代的劳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及现代的社会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第2版，第678页。

义社会也是有的。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这一论断是正确的。但是，前此的极左思潮却不承认这条历史规律，硬要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谈商人、市场等商品经济范畴。假如你不识时务，偏要谈论，那么，等待着你的无疑就是严厉的批判和深刻的检查。这种情况，大家记忆犹新，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总之，已往的史家们对商人、市场之类的问题不屑谈；近来的史家们则不敢谈。因此，这些重要问题的历史研究至今还处于发轫阶段。市场史则几乎是空白。现在，这个空白不能不填补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在全国形成从未曾见的繁荣景象。这就令人感到填补这个空白的迫切。当然，要填补谈何容易，因为前人给我们留下的这方面的凭借实在不多。可喜的是，目下已有一块初炼就的石头开始来填补了。这块石头就是龙登高博士的这部著作。

登高与我一块治中国古代经济史有年。他刻苦勤学，锐意进取，胆识俱佳。他自选宋代东南市场为题，专意探索，成博士论文近20万言，云南大学出版社为之刊行，颇引起同业专家的好评。毕业后继续精进，今又完成这部著作。我看到薪尽火传，青胜于蓝，怎能不高兴呢？愿登高不以已有的创获为满足，日新不止，作出更多的贡献！跂予望之，是为序。

李 埏

一九九七年元旦于昆明

时年八十有三

前言

一

当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建设逐渐全面展开时，人们的理论视野也随之扩大。建设中的现代市场经济是怎样从传统市场的历史土壤中成长的？传统市场的历史遗产对当前市场经济建设无疑不乏借鉴意义，那么，它的发展轨迹如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凡此等等，都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思索。

中国传统市场作为学术界的一个新兴领域，迟至 20 世纪 80 年代才开始正面涉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自 50 年代后交换与市场一直成为经济建设与学术研究的禁区，经济史学界和历史学界的大多数学者，长期以来对于市场的概念都比较陌生。只有学术素养与知识结构殊异的少数前辈学者，以其科学的求实精神在这一领域孤独地默默拓荒，业师李埏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先生对商品经济史的思考与研究也从不间断，至 80 年代初科学的春天来临时，他便撰文急切地吁请加强商品经济史的研究。^①而直接开启传统市场研究这一新领域的序幕，当推前辈学者吴承明先生，他在 80 年代前期发表了关于明代、清代、近代市场史的系列论文，并在《市场理论与市场史》一文中呼吁加

^① 李埏先生在其代表作《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载《历史研究》1964 年第 1 期）一文中，对唐代小生产者的市场活动进行了精辟的个案分析和计量分析，这在当时可谓别开生面。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商品经济问题》（载《经济问题探索》1983 年第 3 期）中又对其多年的研究进行了理论总结。

强市场史的研究。^①前辈学者的开拓之功,使该领域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建基于较高的学术起点之上。不过在 80 年代,市场史研究仍如同空谷足音,应者寥寥。直到 1992 年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建设明确提上国家大政方针后,该领域的研究才受到广泛重视,短期内骤然形成“显学”。近年来,中国传统市场的研究成果逐年增多,一系列学术会议相继召开。1994 年 12 月在北京举行了“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学术研讨会,1995 年 11 月又举行了“小农经济·市场·现代化”研讨会,1996 年 6 月召开的中国经济史年会也以传统市场为主题。海外的中国经济史学界则起步稍早,其研究成果在 1989 年台湾学者组织的一次专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得到集中检阅,会后结集出版了中文和英文的《中国市场经济变迁》。^②

由于中国传统市场史时间跨度长,涉及领域广,相关研究成果多,进行综合的学术回顾与评述需要花费相当长的篇幅。笔者在 1991 年对开始起步的古代市场研究进行了评述,^③当时学术成果零星而分散,学术评介也相对薄弱和简略。1994 年叶茂等发表了《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研究述评》,^④对秦汉以来至 19 世纪 90 年代的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的当代研究状况进行了长篇综合评介。因此本书对学术史的回顾不拟赘述,仅指陈当前市场史研究面临的一个客观事实:随着中国传统市场研究的逐步加强与深入,一部贯通古今的市场史势在必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传统市场的

① 吴承明先生的系列论文后来都收入其著作《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市场理论与市场史》,载《平准学刊》第 3 辑下册。吴先生新近的研究成果收入《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

② “China's Market Economy in Transition”, Academic Sinica, 1990.

③ 龙登高:《近年来封建市场研究概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 年第 9 期。

④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 年第 4 期。

研究在一个新的起点上继续深入，有所突破。

目前的研究主要注重于断代的考察和局部的探索，这对于一个新兴领域是至关重要的。但由于缺乏全面的系统的把握，这种断代的、局部的考察有时难免陷入某种误区，缺乏动态的历史感和综合性的整体感。这些缺陷，又因中国传统市场发展自身的特征，而引发某些本可以避免的错误。

傅衣凌先生提出中国传统社会的多元结构，^① 李根蟠先生揭示中国传统农业的“多元交汇”体系，^② 笔者深以为是，事实上传统市场也表现出强烈的多元交汇格局。且不论农业经济、游牧经济、海洋经济下市场形态的复杂多样，单就主体农业区域而论，市场发展的不平衡性非常显著。即使在同一经济区域，市场多元交汇的格局不仅表现于核心区与边缘区严重的不平衡，而且表现于多种经济现象犬牙交错，交互并存。在各个历史时期，发达地区既出现不少新的经济发展趋势，也可能残存着旧时代的痕迹；在落后地区，既顽固存在着落伍的经济现象，而超前的历史景观也不时偶露峥嵘。这使市场发展显得错综复杂，整体把握相当困难，稍有不慎，就会陷入以偏概全的错误。如果抓住落后的地区与经济现象而不及其余，就会得出发展迟滞的观点；反之，抓住发达地区或某些新兴的、超前的趋势而不及其余，又会得出盲目乐观的结论。由此可见，传统市场的研究，必须紧扣多元交汇格局的特征，从整体上把握市场发展的复杂性，避免孤立的片面的论述。

与此相关，中国传统市场是在强烈的曲折性与反复性中不断

① 傅衣凌：《传统社会的多元结构》，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

② 李根蟠：《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特点的再思考》，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最近，李先生这一思想又有新的进展。

发展的，这与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发展进程紧相一致。尤其是以王朝为周期呈现出复苏—兴盛—衰落的轨迹至为明显，这种经济发展周期循环往复，在螺旋式上升的同时，不时出现很大程度上的原有水平上的重复与停滞，甚至一个或几个经济周期发生长期的倒退。这不仅使中国历史呈现出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许多经济现象也随之陷入循环波折，只能螺旋式地缓慢而艰难地前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不少新生的经济因素，在经济萧条时中断、消失，在下一个经济长周期中，又几乎是从零开始萌生、发展，或者要在几个周期之后才会重新出现。这就使传统社会中新的经济质素，尤其是促进传统经济产生裂变的新因素，步履蹒跚，发展滞缓，更为严重的是，个别的技术与经济新质素，竟在大动荡中消失并永不复生，没有留下任何历史遗产。唯其如此，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有“早熟论”、“变态论”、“停滞论”、“长期延续论”，对中国古代市场有秦汉市场经济论，有汉唐商品经济水平高低之争，全国统一市场形成时限之争……无庸讳言，由于对中国市场史的整体进程及其独有特征的宏观认识不足，在不少问题上，各个断代的研究者往往陷入诸多困惑，至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感。

结合以往史学界沸沸扬扬的几大讨论，似乎都可以从中国传统社会的曲折反复性与多元交汇特征方面找到其症结，反映出对这些特征把握的畸轻畸重。例如，关于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起始时段问题，关于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等，百家争鸣，歧异纷呈。这些讨论烙上了强烈的时代印痕，但无疑推进学者们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识，尤其是对其曲折反复性与多元交汇特征的认识。

近十几年的传统市场研究呼唤一部中国传统市场史的早日面世，并以此推动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同时学术界已有的研

究成果又为这样一部传统市场通史准备了良好的前提。基于此，笔者不揣鄙陋，综合前贤今人的成果，在这方面作了初步的尝试。

二

自 80 年代后期以来，笔者在业师李埏先生的引导下，涉足中国传统市场已有十个年头。早在 80 年代前期，先生就以其独具前瞻性的科学视野，试图引导他的一位研究生从事该领域的探索，因时机欠成熟而未果。当先生再次引导我走入这一领域时，“市场”在现实生活中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在史学界还是一个使用频率很低的概念，我只能在一片迷茫中艰难行进。然而一旦走进这个陌生的领域，我便为之如醉如痴。

这是个十分诱人的课题。中国传统市场具有怎样的特色，它与西欧等地的传统市场相比具有哪些差异？传统市场源远流长，并且曾经发展到相当的水平，为什么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迟迟未能成为主导中国经济的轴心？中国传统市场如何因应急剧变动的近代社会，它自身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当 20 世纪最后十年中国逐渐跨入市场经济时代，传统市场对这一伟大的历史变革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它能够给人什么样的历史启迪？……种种思索一直萦绕于怀，欲罢不能。渐渐地，我竟萌发了在点滴积累的基础上撰写一部中国市场史的设想。

在我做出这一决定之时，我决没有料到将走上一条如此艰巨的求索之路。在最初阶段，我仿佛爬行于一条断断续续的荒野崎岖小路，许多路段人迹罕至，不得不披荆斩棘，饱尝筚路蓝缕之艰辛。资料的积累是如此繁复庞杂，我仿佛置身于茫茫大海，在古代文献的海洋中驾驶着一叶小舟无日无夜孤独而行，又如置身于空旷的沙漠中，在文物成果中苦苦搜寻。当传统市场的研究成

为热点后，我又仿佛从孤独的原始荒野来到热闹的现代都会，如饥似渴地穿行于琳琅满目的学术世界中，永无厌足地汲取着同仁贤俊的成果，同时又承受着强劲的竞争与压力。种种困难与艰辛，曾使我发生动摇，甚至几度想退缩，然而，对历史、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使我不揣弩钝，面对挑战迎难而上。

这里我不能不深切感谢我的导师李埏先生。先生治学经历曲折坎坷，而对科学的执着追求则始终如一，百折不挠，即使在险恶的环境下也不移易。这种精神强烈地感染着我，激励我在学术追求中不退缩，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先生的治学方法同样使我受益无穷，他早年师从钱穆、张荫麟、吴晗等国学大师，后又私淑侯外庐先生，过从甚密，皆得其真传。钱先生之博通，张先生之专精，吴先生之考证，侯先生之理论，溶汇于先生学术思想之中，并以此教导和培养学生。我以弩钝之身，在学习与研究中深切体会，以追随先贤业师治学之道。同时我有幸为先生整理其学术精髓《唐宋经济史略论稿》，在此过程中不仅对先生纵贯古今的学术思想有了更深入的领悟，而且对商周农村公社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发展脉络有了全面的把握，本书的不少观点和思想即直接承继于此。可以说，如果不是站在业师人梯之上，本书的完成是不可想象的。

三

最初我曾打算按“封建市场史”的内容撰写此书，但总觉得有所缺陷，并且意犹未尽。“封建”一词的界定本身就是模糊不定的，汉语封建的本义和源于西文的同名译词颇多歧义，而“封建社会”的涵义因学术界在一段时间受教条主义的影响而陷入矛盾和悖论之中，众说纷纭，并由此导致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在相当

一段时间里走了弯路。诸如封建社会的分期、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重大问题，长期纠缠着众多学者，因概念界定的歧义而难以自拔。如果继续以封建市场作为研究对象，必然使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受以往争论的拖累，重蹈过去的泥淖中，不能轻装上阵，以新姿态去开创新的天地。此时，傅衣凌先生《传统社会的多元结构》一文给了我灵感，该文是傅先生临终前对他自己以至学术界的反思与总结，可以说是一位杰出史学家的学术遗言，在当时有振聋发聩之功，于我亦如拨云见日，遂决定将这一课题定名为“中国传统市场史”。无独有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刊载了《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研究述评》一文，由此坚定了我的自信。一词之差，决不仅仅是行文上的更变，而意味着体例与内容上的更新，也意味着学术观念的升华。

本书将传统市场的时间，上限定于公元前5世纪春秋战国之交，下限定于19世纪中期，大体分为四个阶段。中国市场发展是渐进的、曲折的历史过程，因此其阶段的划分不是绝对的，其界限有时是不明晰的甚至是模糊的。本书每篇撰述一个发展阶段，但事实上其界限多交错重叠。第一篇将中国传统市场的起点定于春秋战国之交，重点论述战国秦汉中期传统市场的第一次高峰；第二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传统市场的曲折发展，事实上魏晋时期的种种迹象均可直溯至东汉；第三篇侧重于两宋市场的再度兴盛，实则此时变化多滥觞于唐后期；而第四篇明清市场的成熟，客观地说应开始于明中叶。不过本书在分期上没有打乱王朝体例，一则因为渐进发展的市场史分期很难有绝对的界限，一则是出于叙述的方便，并保持王朝周期原貌。

本书力求全面系统地论述传统市场的历史发展，但同时避免千篇一律，不讲求面面俱到。在各个历史时期，论述各有侧重，避免雷同化的平铺直叙。对各个时期都具有的某些现象，选择最为

突出的时代详加介绍，并在其中略述其渊源流变；对有的问题，只是点到为止，或略加提及，而对有些独特之处、或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则展开深入探讨。

由于中国传统市场的多元交汇格局和曲折起伏性，考察其具体发展和种种经济现象时，本书把握一个重要原则：把各个阶段、各个时代的市场发展置入一个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来考察，把特定的经济现象置入特定的历史条件中来分析，切忌用孤立的眼光举例求证，避免简单的就事论事，力戒武断的定性与结论。譬如，在某个时代与某些地区，出现一些超前的历史现象，如果它只是一种偶发的存在，在当时不具有多发性，在其后没有形成延续性过程，那么，它就不足以形成具有历史发展连续性的趋势，不能作为市场演进过程中的阶段性现象来分析。同样，某个时代或某些地区残存着一些落伍的现象，当它只是一种孤立的存在时，就不足以反映一个时代的普遍性质，只能视为多元交汇格局的一种体现。

在体例和内容上，传统市场的多元交汇格局在本书没有严格的反映，因为本书主要侧重于中国历史上主体经济区的市场发展主流，对于旁支的、边缘的市场现象则很少涉及。在资料的选择上，则力求采用那些足以代表主流发展方向的论据，力求反映传统市场发展的脉络和演进趋势。中国地域差异显著，考察各个历史时期不可能遍地开花，全书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并且有选择性地针对阶段性发展较充分较成熟的地区或区域详加论述，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入手分析以求反映中国传统市场的主流与发展态势和脉络。

作为一部时间跨度约 2500 年的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受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尤其是笔者的学识水平所限，它还存在许多缺陷。例如，本书基本上局限于国内市场，而与之紧密相关的对外